



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

「对

陕西当代文化
名人访谈

└ D I A L O G U E

话」

黎峰 沙莎·编著

他们的人生经历
是一个时代的印记

他们
洞烛着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陕西出版基金资助项目

「对

陕西当代文化
名人访谈

话」

L D I A L O G U E

黎峰 沙莎·编著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对话: 陕西当代文化名人访谈 / 黎峰, 沙莎编著.
—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16
ISBN 978 - 7 - 224 - 11995 - 4

I. ①对… II. ①黎… ②沙… III. ①文化—名人—
访问记—陕西—现代 IV. ①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47416 号

对 话

——陕西当代文化名人访谈

编 著 者 黎峰 沙莎

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710003)

印	刷	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开	本	787mm × 1092mm 16 开 20.5 印张 1 插页
字	数	296 千字
版	次	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	号	ISBN 978 - 7 - 224 - 11995 - 4
定	价	45.00 元

目 录

Contents

陈忠实：从自我否定自我反省中获得力量 / 002

- 一 承受着生活的艰难，心怀乡情友谊的欢欣 / 004
- 二 付出全部苦心和苦力弥补先天的不足 / 006
- 三 狠下心把诱惑人的美事排开 / 011
- 四 把独特的体验充分展示，大约就是创造 / 015
- 五 尽我有限的能力做了一些事 / 019
- 六 在人生的重要阶段上把握住自己 / 024

石兴邦：考古是我的英雄梦 / 032

- 一 “关学”对我的影响太大了 / 034
- 二 选择边政系，做了考古才知道还真是学对了 / 038
- 三 新中国成立时考古红得很，自己想肯定可以有所建树 / 042
- 四 考古就是把“死”的东西变成活的历史 / 045
- 五 兵马俑、法门寺让我见证了陕西的荣光 / 050
- 六 和文物打交道必须身正心静 / 055

张岂之：以有涯人生做无涯探究 / 058

- 一 师长们的影响让我决心走学术研究的道路 / 060
- 二 学术道路上的曲折 / 064

- 三 用中国的语言来讲解中国的历史与思潮 / 067
- 四 学海无边，只有谦虚努力才能稍有所得 / 069
- 五 学习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应着重提炼其中的深沉精神 / 072
- 六 做有理想的人，做严谨求实的学问 / 075
- 七 做人文学人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 / 078

张锦秋：人生要有理想永攀登 / 082

- 一 家庭培养了我自立、拼搏、坚持的精神 / 084
- 二 父亲充满诗意的话，让我选择了学建筑 / 090
- 三 来古城西安是优选方案 / 093
- 四 在艰难的时代里锻炼意志和心理承受力 / 098
- 五 探索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可能性 / 103
- 六 不是张锦秋的大气，而是汉唐文化的大气 / 108
- 七 有了目标，就要执着 / 112

肖云儒：生命在磨刀石上迸出火花 / 118

- 一 寡母近乎冷酷地锤打自己的独子 / 120
- 二 老百姓的天然乐观感动了一个脆弱的知识分子 / 124
- 三 理想主义激情感染了我一辈子 / 130
- 四 评论家是向社会大众发言的 / 133
- 五 生活把你带到哪儿，你就要在哪儿发展自己的优势 / 137
- 六 人生要像游泳一样冲在潮头上 / 143

赵季平：随着时代的步伐一路往上走 / 148

- 一 了解了传统音乐，就了解了音乐的母语 / 150
- 二 我们这一代人是从小田间地头走过来的 / 153

- 三 创作要有自己的根 / 156
- 四 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起飞 / 159

叶广岑：踏在时代的脉搏上 / 162

- 一 我从小想的比说的多，很孤独 / 164
- 二 没有经历过苦难，就是一个懵懵懂懂的人 / 167
- 三 “中年失业”，沉下心好好写自己的作品 / 171
- 四 一个作家能得到老百姓的真心，是非常让人欣慰的事 / 175
- 五 但写真情并实意，任它埋沉与流传 / 181
- 六 人格有魅力，文章才有魅力 / 185

莫 伸：我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 / 190

- 一 知青生活对我这一生影响太大了 / 192
- 二 因为没有真正说透它，所以有一些人至今认识糊涂 / 196
- 三 小说《窗口》催生了“窗口单位” / 203
- 四 决不能动摇自己 / 208
- 五 收获了不少，同样也就丢失掉很多 / 216
- 六 娱乐至死成为一种强大的观赏存在，我为此担忧 / 218
- 七 长期的写作生活，使得我能够心平气和 / 222

贾平凹：写作实在是我的宿命 / 230

- 一 父亲经历的几件事情决定了我的命运 / 232
- 二 你得不断把根往石头下的土壤里扎 / 235
- 三 要不停地给自己鼓劲儿 / 240
- 四 要耐烦，把心静下来 / 246
- 五 真正参与到社会里 / 249

六 要善良，能大度，能宽容 / 256

高建群：我绝不允许自己平庸 / 264

- 一 上天给你那么多苦难是有原因的 / 266
- 二 路遥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种精神感召 / 269
- 三 艺术家请向伟大的生活本身求救吧 / 274
- 四 做人我可能低调，作文我不允许自己平庸 / 279
- 五 我的书画是顺应生命表达的载体 / 281
- 六 用一生的时间来干一件事情 / 286

杨争光：热心肠在生活之中 冷眼在世事之外 / 290

- 一 我至今都没有安全感 / 292
- 二 我很庆幸，我坚持下来了 / 296
- 三 不能把判断的权力完全交给时间 / 301
- 四 我的写作从来没有过随意轻率的时候 / 303
- 五 思想匮乏和想象力枯萎是世界性的 / 309
- 六 热心肠在生活之中，冷眼在世事之外 / 316

他们的人生经历
是一个时代的印记

他们的精神之光
洞烛着人类的未来



陈忠实：

从自我否定自我反省中获得力量

“我尊重人的忠诚老实、本分勤俭这些美德的规范，却更崇尚一种义无反顾的进取精神，一种为事业、为理想而奋斗的坚韧不拔和无所畏惧的品质……让我挖一辈子土粪而只求得一碗饱饭，我的一生的年华就算虚度了。我不能像阿尔青那样，过只求温饱而无理想追求的猪一样的生活。”

本文最初由黎峰2010年访谈整理，曾以《每个作家都在思考这个时代》刊于《江南》2010年第4期。2015年前后多次进行了补充采访。本书编辑过程中，陈忠实先生不幸逝世，谨致哀悼。

陈忠实：

从自我否定自我反省中获得力量



陈忠实：1942年8月3日出生于西安市灞桥区霸陵乡西蒋村。1962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，之后在乡镇工作20年，历任村小学民办教师、中学教师，公社党委副书记、革委会副主任，区文化馆副馆长，区文化局副局长等职。1982年调入陕西省作家协会，从事专业创作。1985年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，1993年至2007年任陕西省作协主席。2007年至2016年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陕西省作协名誉主席。国家一级作家。

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。短篇小说《信任》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；《渭北高原，关于一个人的记忆》获1990—1991年全国报告文学奖；长篇小说《白鹿原》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，并有多种外文译本。

2016年4月29日，陈忠实先生因病逝世。

一 承受着生活的艰难，心怀乡情友谊的欢欣

问：陈老师的老家在西安东郊的西蒋村，我专门去那里探访过。你小时候那里是什么样的景象？

陈忠实：我家紧偎着白鹿原的北坡坡根。我记忆中，20世纪50年代全村不足40户人家。村庄背后的原坡上，是一台一台的梯田，只种一料麦子。春天无疑是最富诗意的季节，麦苗的绿色呈现着起伏的波浪，荒坡上也是绿草。到6月收割过麦子，直到9月末再种麦子，大半年都是赤裸的土地。因为缺水源，收麦后种不得秧苗。山坡上是我的开心之地，给牛割草的后晌，常常陶醉在逮蚂蚱的快活之中。

家门前是灞河和不大宽阔的河川。这是养育生命的宝地，收罢麦子又种苞谷，一年两料基本保收，有灞河水的引灌作保证。

灞河在平时清澈见底，游泳洗澡再好不过，可惜我没学会浮水。

问：农村生活给你写作提供了什么？能谈谈你的家庭和你当时在农村的生活吗？

陈忠实：我生长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。听说我的老爷爷（父亲的爷爷）曾经是私塾先生，而我父亲已经是一个纯粹的农民，是村子里头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打算盘，也能提起毛笔写字的农民。

农村生活，首先提供给我的是生存依托，依靠收获土地上的麦谷生存。传统文化、传统道德、传统习惯和风俗，完全在不知不觉，又不留任何痕迹的无意识状态下完成对我的影响和传承。

我在少年时期没有任何自觉的反叛行为。在进入高中读书以后，尤其是接触了国内外的文学作品后，往往会引发我对自己生活的乡村里的人和事的反观。

我和乡村人一样生活着，承受着生活的艰难，也有乡情友谊的欢欣。

我后来进入社会，环境也是乡村。尤其是在最基层的公社工作了十年，

还是在家乡的地盘上。我是一个最底层的干部，走出公社大门，看见的就是男女老少的乡村人的面孔。我那时候是完完全全的专职乡村干部，接触多种性格的乡村干部和群众，对家乡农村的了解和理解逐渐丰富。那个时候正是“文革”期间，我早已断了文学创作的爱好。这样反而因祸得福，我在乡村专心致志做事，做事的过程也就加深了对乡村生活的积累，倒是避免了以作家的角色深入生活、体验生活的局外人之弊端。

新时期文艺复兴伊始，我预感到写作可以作为人生追求的事业来干的时候，便调到相对比较轻松的文化馆工作，致力于写作这个人生兴趣。这时候和这之后，我越来越感觉到20年基层工作尤其是十年公社工作经历的宝贵。我甚至感到，如果没有那十年公社工作的经历，很难设想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是怎样一种景象，也很难设想会不会有《白鹿原》的创作。

问：因为家庭贫穷，你在中学时曾休学一年，这也导致你高考失败。这段经历，愿意给我们讲讲吗？

陈忠实：休学这件事是真，说这导致高考失败，更多的也是我当时的怨天尤人。我1962年高中毕业，恰逢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月。高校招生名额大大减少，我们班剃了光头，年级四个班也仅仅考取了几个人，而上一年我们学校有50%的学生考取了大学。我名落孙山回到乡村，陷入无边无际的彷徨苦闷。那时我曾经怨天尤人：“全都倒霉在休学那一年……”以至于父亲在弥留之际，对坐在他身边的我说：“我有一件事对不住你……”父亲说不该让我休那一年学，说错过一年，让我错过了20年。我浑身战栗，久久无言。

休学是在初中，我13岁那年。父母亲都是地道的农民，那一年他们实在无力承担两个儿子的学费。父亲便有了个精确计划：待到第二年我哥哥初中毕业，父亲谋划着让他投考师范学校。师范学校的学杂费和伙食费全由国家供给，据说还发三块零花钱。那时候我就可以复学接着念初中了。就这样我去学校申请休学一年。我们教务处那个女老师还对我说：“你休学一年，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见得能改变，一年后你怎么能保证复学呢？”我便说：“老师，没关系，我年龄小。”后来办完休学证书，她还送我，安慰我：“我同意

你的打算，休学一年不要紧，你年龄小。”我猛然看见老师那双睫毛很长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。我迅即垂下头避开她的目光，要是再在她的眼睛处多驻留一秒，我肯定就会号啕大哭。

辍学后，我与家庭一起抗拒着穷困的生活。我抱着不满周岁的妹妹在村里村外游荡，逗逗小动物，在树荫下、灞河边回忆着自己在学校的快乐时光，感受着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妙。有一天，公社的书记在村里碰到了抱着妹妹的我。了解情况之后，书记发火了，认为新社会让贫农的孩子失学，实在是本乡土的耻辱。他立即与中学校长通电话，要他想尽一切办法让我复学。后来学校减免了一些学杂费，还给了助学金，我就复学了。

二 付出全部苦心和苦力弥补先天的不足

问：高考失败后，你回到村里当上了民办教师。是不是就在这种情况下，选择了走文学创作这条路？

陈忠实：我在小学阶段没有接触过文学作品，尚不知世上有“作家”和“小说”，初中二年级时喜欢上了文学。当时阅读《三里湾》，这也是我平生阅读的第一本小说。我随之把赵树理已经出版的小说全部借来阅读了。这时候的赵树理在我心目中已经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，我人生中发生的第一次崇拜就在这时候，他是赵树理。也就在阅读赵树理小说的浓厚兴趣里，我写下了平生第一篇小说《桃园风波》，是在初中二年级的一次自选题作文课上写下的。

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，我的兴趣就不仅仅局限于验证自己的生活印象了。一本本优秀的文学作品，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幅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的画卷。我的精神里似乎注入了一种强烈的激素，跃跃欲成一番事业了。自幼父亲对我的教诲，比如说人要忠诚老实啦，人要本分啦，勤俭啦，就不再具有权威的力量。我尊重人的这些美德的规范，却更崇尚一种义无反顾的进取精神，一种为事业、为理想而奋斗的坚韧不拔和无所畏惧的品质。父亲对我的人生安排很实际，要我念点儿书，识得个字、算个数儿，不叫人哄就行了。他劝

我做个农民，回乡种庄稼，他觉得由我来继续以农为本的农业是最合适的。开始我听信他的话，后来就觉得可笑了。让我挖一辈子土粪而只求得一碗饱饭，我的一生的年华就算虚度了。我不能像阿尔青（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里面保尔的哥哥）那样，过只求温饱而无理想追求的猪一样的生活。

大约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，我想搞文学创作的理想就基本形成了。但到了1962年，我高考名落孙山。我是我们村子里第一个高中毕业生回乡当农民，很使一些供孩子读书的人心里松了劲儿。我成了一个念书无用的活标本，我的压力无形中又增添了许多。回到乡间，除了当农民种庄稼，似乎别无选择。痛定思痛后，我决定在这种别无选择的状况下，自修文学。

人获得知识，最理想也最便捷的途径就是接受高等教育，缺失了这个条件的我，只能选择自修。虽然同样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知识，只是比正规的高等教育的途径更艰难许多。我阅读过一些中外作家成长道路上的文章，给我的总体感觉是，在文学上有重要建树的人当中，幸运儿比不幸的人要少得多。要想比常人多有建树，多有成就，首先要比常人付出多倍的劳动，要忍受难以忍受的艰辛甚至是痛苦的折磨。有了这种从旁人身上得到的生活经验，我比较切实地确定了自己的道路，消除了过去太多的轻易获得成功的侥幸心理，这就是静下心来，努力自修，或者说自我奋斗。

我那时给自己订下一个目标，自学四年，练习基本功，争取四年后发表第一篇作品，就算在“我的大学”领到毕业证了。为了避免太多的讽刺和嘲笑给我带来心理上的伤害，我使自己的学习处于秘密状态，与一般不搞文学的人绝口不谈文学创作的事，每被问及，只是淡然回避，或转移话题。即使我父亲也不例外。我在爱上文学的同一时期，就知道了人类存在着天才的极大差别。这个天才搅和得我十分矛盾且又痛苦，每一次接到退稿信的第一反应，就是越来越清楚地确信自己属于非天才类型。尤其想到刘绍棠戴着红领巾时就蜚声文坛的难以理解的事实，我甚至悲哀起来。我用鲁迅先生“天才即勤奋”的哲理与自己头脑中那个威胁极大的天才的魔影相抗衡，而终于坚持不辍。如果鲁迅先生的话不是欺骗，我愿意付出世界上最勤奋的人所能付出的全部苦心和苦力，以弥补先天的不足。

我的努力没有白费，到1965年春天发表了散文处女作《夜过流沙沟》，提前一年多实现目标。这篇文章的发表，首先使我从自卑的痛苦折磨中站立起来，自信第一次击败了自卑。我仍然相信我不会成为大手笔，但作为追求，我第一次可以向社会发表我的哪怕是十分微不足道的声音了。我确信契诃夫的话：“大狗小狗都要叫，就按上帝给它的嗓子叫好了。”我不敢确信自己会是一个大“狗”，但起码是一个“狗”了！反正我开始叫了！

1965年我连续发表了五六篇散文，虽然明白离一个作家的距离仍然十分遥远，可是信心却无疑地更加坚定了。

问：在基层公社工作的十年，你当过党委副书记、革委会副主任。回首这段经历，有哪些事情让你难以忘记？

陈忠实：我是1968年末临时抽调到公社。此前中央文件指示刚刚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搞一个中心运动，清理阶级队伍。我所在的那个不过万人的公社，竟然清理出来几百个“阶级敌人”。年末又有中央文件指示，要对被清理出来的“阶级敌人”落实政策，便抽调出七八个公社下属的中小学教师组成专案组，公社领导做组长。经过近一年逐村逐单位一个一个落实定案，过程且不赘言，结果是没有定性一个“阶级敌人”。原因很简单，取消了造反队的多个村子，潜存的派性更难消除，那些被当作“阶级敌人”拉出来的人，多是派性的受害者。

紧接着一个中心工作，是恢复各个村子里被“文革”造反派搞瘫痪了的党支部，难度也很大，主要障碍还是派性。费时近一年，把多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建立起来，最后是公社党委的建立。这项工作结束后，我和另一位中学团委书记留下来在公社工作。我之所以被选在公社协助工作，我想主要原因是文字能力，为领导写讲话稿，写年度或阶段工作总结等。领导留我时有一次简短的谈话，很斟酌地肯定留我的原因，是把握政策较稳当，人还可靠。

直到1973年，我才正式调入公社，解决了公职。因为我在公社里是最年轻的干部，也因为有了四年多的农村工作实践，此时“学大寨”运动已成为公社持久性的工作，我总是被安排到重点工程去完成任务，我也乐于干实事。

我曾协助一位主管农业的公社领导，在原坡缺水地区建设小型蓄水库塘，使每个生产队都有了多少不同的水浇地，曾经被上级推广过经验。我独立搞过两次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。一次是在麦收后和种麦子之间的两个月时间里，完成 800 亩跑水跑肥的山坡地改造为平整梯田。这些被改造的平整梯田，至今也是一劳永逸地发挥着效益。又一次是为家乡灞河修筑了 8 华里河堤，得到上级拨款资助，临水面有水泥板护贴。从先一年入冬动工，到第二年发生涨水之前完工，这条可以对开汽车的河堤修成了，30 多年来再未发生过灞河涨水冲毁农田的灾害。这两项较大的工程，都发生过平均摊派任务的问题，然而那个时候却不犯政策之忌，后来不久被纠正了。现在在个体生产的乡村，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。

我在这里有自我表彰之嫌。

我在乡村工作中接触了多种人，也了解了乡村，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方便，却是当时没有想到的事。

问：那这段时间在坚持创作吗？

陈忠实：“文革”期间，我基本不再想文学创作的事。后来到公社工作，就专心于乡村与农民打交道的事了。到“文革”后期，一些文化艺术单位恢复工作，偏重于鼓励“工农兵业余作者”写作，我是被激发起来的一个，我才发现文学创作的喜好没有消亡。然而我很清醒，文学创作当不得正事干。我只是在有闲而且可以相对清闲一段时间的情况下，便写上一篇。四年写过四篇短篇小说。我把这种写作自我定义为“过瘾”，过一回文字表达的瘾。

我在新时期文艺复兴的 1978 年冬发表了短篇小说《南北寨》，1979 年写了十余篇小说，其中《信任》获得年度全国短篇小说奖。

问：《信任》这个小说，你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到，它对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？

陈忠实：说来话长。这篇小说的发表无疑给我以最真实的也是最迫切需要的自信。1979 年初夏，我去刚恢复不久的陕西作协参加会议。会议即将结束时，陕西日报文艺部的吕震岳先生来到我住的房子，约我写篇小说：“你

以前的几篇小说我看过，很不错，有柳青味儿。”我便应诺下来。我那时候的心态刚刚调整过来。三年前的1976年春天，刚刚恢复的《人民文学》约我到北京参加一个写作笔会，我写了一篇适应当时反“走资派”的小说在该刊物上发表了，引起较多反响。随着“四人帮”的倒台和在一切领域里的拨乱反正，我在社会政治领域里的巨大欢欣与在写作上的失挫，形成剧烈的心理冲突，直到1978年的冬天，仍然陷于真实的又不想被人原谅的羞愧之中。

记得我当时正在灞河河堤的会战工程中领工，我和指挥部的同志住在河岸边土崖下的一座孤零零的瓦房里，生着大火炉，睡着麦秸铺。在紧张的施工过程中，我先后读到了两篇记忆犹新的短篇小说，先是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上的陕西青年作家莫伸的《窗口》，后是刘心武的《班主任》。莫伸比我年轻许多，而刘心武和我同龄，然而他们都是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，都是从刚刚解冻的文坛土壤里蹿出来的惹人眼目的新苗。我读着这些优美的小说不由得联想到自己的失挫，更深地陷入羞愧之中，便把全部激情都转移到我所指挥着的河堤工程上。

直到这个工程完工的1978年秋天，我便调入西安郊区文化馆。正是在我刚刚涌起新的创作激情时，我遇见了吕震岳，他向我约稿，我十分珍惜。那篇反“走资派”的小说所产生的对我的看法，仍然是我的神经最敏感的因素，因而对那些依然还约我稿的编辑，更多的是一种被信赖、被理解的感遇之恩了。想着应该尽力写好一篇小说送上，不致使这位初次见面的兄长失望。然而正在构思中的一篇小说篇幅较大，原计划给《人民文学》的，不怕长，便想着写完这个短篇之后，接着为陕报老吕再写，7000字是一个不能突破的限制。这时候，接到吕震岳的一封信，信皮和信纸上的字，都是用毛笔写的，字很大，虽称不得作为装饰和卖钱的书法，却绝对可以称作功夫老到的文人的毛笔字。内容是询问稿子写得怎样了，一个月过去了怎么没有见寄稿给他。我读罢便改变主意，把即将动笔要写的原想给《人民文学》的这个短篇给老吕，关键是怎样把原构思的较大的篇幅压缩到7000字以内。如果就结构而言，这个短篇是我的短篇小说中最费思量的一篇，及至语言，容不得一句虚词冗言，甚至一边写着一边码着纸页计算着字数。写完时，正好7000字，我